

中国早期文明陆海秩序中的“南海”

文/吴春明

南海是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东西二洋”航路的核心海域，也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中国—四方—四海”陆海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留下了特殊的历史记忆。

南海之滨包括我国岭南沿海、海南岛至东南亚沿海的跨界海洋文化区域，史前、上古海洋聚落形态集聚分布，关系密切并最终整合一体，成为环中国海海洋文化特殊而重要的一个区系。文化因素跨时空分布的格局，也显示了土著先民的频繁的海洋文化交流，是形成历史时期南海沿岸与跨海之航路的基础。

华夏文明“中国—四方—四海”秩序中的“南海”

汉文史籍记载的中华文明形成期的“天下”秩序是“四海之内”之“中国四方”，这一同心圆式的差序格局是中华四千年文明史“多元一体”的初期形态。这一格局包括初期“中国”，周边“四方”、“万国”畛域，以及外围“四海为壑”海洋地理，体现了华夏早期的天下观及其对陆海关系秩序的初步概括。

中国早期文明的基本地理构成为“四海之内”之“中国四方”。“中国四方”的中心是多元文化凝聚核心“中原”、“中土”，这里的华夏、汉人之国自称及他称“中国”，以区隔于“四方”蛮、夷、戎、狄之“万国”。

《诗经·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中庸》：“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

我国东部与东南部面临浩瀚的太平洋，现今海岸线一万八千公里，在古人对四方地理还不甚清晰的早期文明阶段，因有“环海”的误识而将古代“中国四方”所在的陆域视为“四海之内”，因而“中国四方”所在的早期文明空间被认为“终于四海”、“迄于四海”。

《尚书·夏书·禹贡》：“教讫于四海。”《尚书·伊训》：“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墨子·非攻》：“一天下总和，总四海之内。”《荀子·不苟》：

“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礼记·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坊记》：“天子四海之内，无客礼莫敢为主焉。”《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淮南子·地形训》：“闾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山海经·海外南经》：“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山海经》诸篇章更是以“四海”为坐标，区分罗列出海内、海外不同方位的地理与人文。

《山海经·海内经》分别另列东、西、南、北“海之内”的“万国”社会，如“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西海之内，流沙之中，有国名曰壑市”等；“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三天子都”；“北海之内，有蛇山者”等。

可见，“四海之内”之“中国四方”是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华夏视野中“中心”与“边缘”、华夏“中原”与“四方（蛮夷戎狄）万国”所构成的“天下”社会秩序的概括，也是华夏“中国”世界观、天下观的中心内容。

中国早期文明的地理边缘被视为“四海为壑”，早期文明被看成“终于四海”。中国文化自史前时代起就建立了以陆地农耕为基础的大陆性文化独大的传统，海域总体上被隔绝于以陆域为限的中华早期文明圈之外。在华夏“中国”的世界观、天下观中，早期文明仅限于“四海之内”的陆域，“四海为壑”、“迄于四海”、“终于四海”、“海外有截”反映了中国早期文明中的海洋“遭遇”与陆海关系的基本格局。

《孟子·告子下》：“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尚书·虞书·益稷》：“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洫距川。”《夏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商书·伊训》：“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相对于“四海之内”、“海内”地理，陆、海分域的交界地带如海岛、沿海的海洋环境中的社会人文，在华夏“中国”的视野中被看成“海外”、“海之外”、“海邦”、“海隅”、“海表”等，即“中国四方”之（陆）域外。

“海外”见于《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山海经》更列有“海外”南、西、北、东方之族群社会。

“海邦”见于《诗经·鲁颂·閟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

“海隅”见于《尚书·虞书·益稷》：“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又《尚书·周书·君奭》：“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海表”见于《尚书·周书·立政》：“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这些“四海为壑”的边缘族群，也要“来假”、“宾服”于华夏。《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淮南子·俶真训》：“南面王则德施乎四海。”《览冥训》：“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

“中国”、“四方”、“四海”依次构成的从中心到边缘、从陆地到海洋的地理分域，是华夏早期世界观与地理认知。战国时齐国邹衍描述的九州环海，也形象地表达了这一理想的空间格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引邹衍语：“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於是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所谓“中国”、“九州”、“裨海环之”、“大瀛海环其外”，体现了华夏、汉人理想的天下观与陆海秩序，表达了古人探索未知世界的“理想”。

严格意义上说，“四海”论述或只是华夏“中国”世界观中的一种愿景，我国的实际海洋地理，只有东、南两面临海，并无四面环海。王子今先生采信古人称内陆较大的湖面为“海子”，据以考察“西海”、“北海”的地望。但在华夏早期的“四海”认知中，对“南海”的方位、地理认知也是逐步推进的。

《禹贡》“九州”畛域大致为长江、黄河干流流域，《禹贡》“九州”语：“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三危地望约在今川、滇西部山地，这里的怒江、澜沧江下流入南海，似无大错。

《礼记·王制》说“四海之内”为“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这里的“四海”作为“九州”陆域边界与《禹贡》差异不大。“南不尽衡山”，应指华夏地理观中的南疆、南海之内不止于南岭之北的衡山，大致指示了“南海”的方位。

《山海经》中有涉及“四海”之“南海”的方位。《海内东经》语：“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海内经》：“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三天子都。南方有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鬱水为今西江上游水系，衡

山、桂山、苍梧、九嶷山等均在今南岭附近，则临近的“南海”也与今之地理吻合。

中国新石器、青铜文化“多元一体”结构中的南海北岸“岛夷”景观

上古华夏地理观中“中国”、“四方”、“四海”的同心圆式的空间差序格局与陆海关系认知，奠基于史前到上古的考古学文化“重瓣花朵”、“多元一体”的谱系结构中。

严文明先生以“重瓣花朵”形象地描绘新石器时代多元文化的空间布局与向心结构。这是一个多元而分层、差异而有序的“同心圆式”布局的文化体系，新石器文化的主体位于黄河、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平原地带，中原文化区是“花心”，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江浙五个文化区是第二层次的“花瓣”，昙石山、大坩坑、石峡、白羊村、卡若、昂昂溪等是第三层次、第二重“花瓣”。“重瓣花朵”式格局，是上古同心圆式空间差序与历史时期“多元一体”的基础。

李伯谦先生梳理的三代青铜文化从中心到边缘的结构未有大变。青铜文化鼎盛期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以商周文化为中心的中原青铜文化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在周王朝的控制范围内，在居于主导的周文化的外围分别形成齐鲁、燕、晋、卫等青铜文化，在商周文化区之外又分别形成北方的夏家店、甘青的辛店与寺洼等、四川盆地的巴蜀、长江中游的荆楚、长江下游的吴越等青铜文化区，及其更外围的东北、新疆、西南、华南与东南等最外围青铜文化区。

在“重瓣花朵”与商周青铜文化体系结构的外围，我国东部、南部沿海和岛屿上发现的“海外”、“海中”、“海隅”等“边缘”、“弱势”海洋文化却独具特色，客观上为中华文化的多样发展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特殊环节。1930~1950年代，正当我国主流考古学界展开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等为主要对象，探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我国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进程之际，林惠祥先生则聚焦粤、闽、台沿海为中心的我国“东南区”及相邻的东南亚，提出以有段石锛、印纹陶遗存为特征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文化不同于华北的内陆文化。到了1950年代，凌纯声先生又提出以我国东海到南海间的水域为中心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理论，将环绕我国东部沿海以“珠贝、舟楫、文身”为特征的“蛮夷”海洋文化，区别于西部内陆以“金玉、车马、衣冠”为特征的“华夏”农耕文化。我国东部、南部沿海地带发现的大量新石器、青铜时代贝丘、沙丘等遗址都位于陆缘海湾、河流入海口与下游河岸、海岛，以海生贝类遗存堆

积为特征,反映了夷、越先民海洋文化发展的初期格局。这些海洋文化遗存,反映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土著先民的初期海洋实践。

南海之滨包括我国岭南沿海、海南岛至东南亚沿海的跨界海洋文化区域,其中从珠江三角洲到北部湾沿岸之间集聚分布的史前、上古海洋聚落形态,关系密切并最终整合一体,成为环中国海海洋文化特殊而重要的一个区系。以环珠江口为中心的南海北岸史前、上古海洋性聚落形态的密集发育,其中珠三角中心地带迄今已发现贝丘、沙丘遗址100多处,贝丘一般位于今珠三角及河口,沙丘则常见于珠江口两侧大陆沿海岸或海岛沿岸,都具有丰富的海洋与水生资源。海湾型贝丘出土的贝类以牡蛎、文蛤和海月贝等为主,河口型贝丘以河蚬最多,另有文蛤、牡蛎等,河岸型贝丘全部为河蚬。

从初步编年看,最初的滨海聚落距今7000~6000年,见于香港沙头角新村下层、东湾下层、深圳咸头岭与大黄沙的下层。距今6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贝丘和沙丘聚落以深圳咸头岭、珠海后沙湾等20多处沙丘为代表,还有增城金兰寺下层等河岸贝丘10多处。距今5000~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末期遗址数量更多、分布更集中,三角洲附近的低岗、土墩及海边的沙岗都成了土著先民的聚居地,其中高要茅岗发现大型干栏式水上建筑,三水银洲聚落面积达到35000平方米,显示出土著海洋文化的壮大态势。珠海、澳门、香港等地史前岩画上还描绘了土著居民舟楫渔归、濒海祭祀等海洋活动图画。此外,海洋聚落还向珠三角两侧的沿海与海南岛扩展,西侧北部湾沿岸有广东遂溪县江洪镇东边角村鲤鱼墩、广西防城港亚答山、马兰咀山、杯较山、社山、蟹岭、番桃坪、营盘村、蟠潭角、大墩岛、钦州芭蕉墩、北海高高墩等贝丘,以及北海西沙坡、牛屎环塘、钦州上洋角、妮义嘴等沙丘遗址,年代从6000~4000年不等。海南岛沿海也先后发现新石器时代海岸沙丘、贝丘遗址十多处,距今5000~2500年,沿环岛海岸密集分布、海洋性渔捞经济为特征。

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南海北岸密集发育的史前、上古滨海聚落形态,应就是早期汉文史籍记载的以“珠玑玳瑁”为献、“海中洲居”的“岛夷”文化景观。《尚书·禹贡》语:“岛夷卉服。厥筐织贝,厥包桔柚,锡贡。”《逸周书·王会解》“伊尹朝献商书”,“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汉书·贾捐之传》:“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汉书·地理志》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

直到历史时期,南海土著后裔居民的生活仍保留着史前以来的珠贝文化内涵,如宋《桂海虞衡志》“蜃”载:

“蜃,海上水居蛸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蜃能没水探取。”明叶盛《水东日记》载:“盖蜃丁皆居海艇中采珠,以大舶环池,以石悬大絙,别以小绳系诸蜃腰,没水取珠。”

环南海史前、上古海洋文化交流的线索

考古学上不仅发现了环南海沿海密集分布的史前、上古岛夷聚落形态,文化因素跨时空分布的格局,也显示了土著先民的频繁的海洋文化交流活动,北部湾两侧的越南北部海岸和岭南沿海史前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这无疑是形成历史时期南海沿岸与跨海之航路的重要基础。

珠江三角洲沿海的珠海淇澳岛、三灶岛、横琴岛、东澳岛、高栏列岛、荷包岛、深圳大铲岛、内伶仃岛、香港大屿岛、赤邈角岛、澳门九澳岛等都发现了史前、上古的岛屿文化遗存,与珠江三角洲腹地距今7000~4000年之间新石器文化面貌一致,应是沿海人群向海洋移动的结果。在华南沿海与中南半岛沿岸间的环南海西侧地带,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海洋文化交流也非常密切。

以红河下游为中心、中南半岛东北沿海为例,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中发现了大量与岭南、海南岛沿海同期文化相同或相似的因素,越南海岸距今6500~4500年查卑、琼文文化,与广西北部湾的东兴、防城、钦州等地的10多处以打制蚝蛎啄、粗砂陶为特征的贝丘遗址的内涵高度一致,与前述环珠江口新石器中期的咸头岭、后沙湾等20多处沙丘、贝丘遗址的内涵也有密切的联系。越南海岸距今4500~3500年的下龙、保卓文化与桂、粤、琼及闽南沿海发现的以树皮布石拍、双肩大石铲、带四突纽玉玦和牙璋为特征的龙山时代至夏代前后文化遗存基本一致。进入青铜时代以后,持续发展的铜豉、扞丘、东山文化序列中,更发现大量闽越、南越、西瓯等文化的代表性内涵,显示出华南沿海百越系统文化的内在整合及文化交流。

有学者通过对新石器、青铜时代东南南部广泛分布的有段石铳和有肩石器这两种代表性石器的时空分布与类型学研究后发现,有段石铳在长江下游起源,主要沿东路南下,经福建而入台湾、菲律宾及太平洋群岛,与上述“原南岛语族”迁徙路线一致;有肩石器起源于珠江三角洲,主要沿西路南下,进入中南半岛与东南亚,与沿海海洋文化的交流同步。^[5]

(作者为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研究人员;摘自《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2期;原题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南海”》)